

[周郢]唐仲冕《岱览》与泰山石刻学

作者：[周郢](#) | [中国民俗学网](#) 发布日期：2009-12-10 | 点击数：1173

摘要：清人唐仲冕《岱览》是古代泰山专著中集大成之作，其书对泰山历代石刻的搜寻、著录、校勘与考释，时有创获，多具新意，贡献之大，较之昔贤，实青胜于蓝。但由于受时代及思想局限，其考论有时缺少通识眼光，史观也多陈腐之见，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的深入与拓展，成为《岱览》的一大学术缺憾！

关键词：唐仲冕 岱览 泰山 古代石刻

在百余种泰山专著之中，若论撰述之精，规模之宏，影响之巨，当首推清人唐仲冕（1753~1827）《岱览》一书。其书共三十二卷，以天章、祝文、仪注、颁赐、目录为首编；原岱（泰山概述）、岱礼、岱庙为《总览》（七卷）；岱顶、岱阳、岱阳东西、岱阴东西为《分览》（十二卷）；岱麓诸山、汶水川泉、徂徕、新甫、灵岩、琨瑞为《附览》（八卷）；岳牧、文献、虞衡、齐谐为《博览》（四卷）；陶山及自叙为《叙览》（一卷）。每卷之前，皆列图绘，文中各附录金石、艺文。整部著作叙次明晰，搜罗博洽，“征引经籍六百五十五种，录次金石七百七十六通”（许桂林《岱览跋》）。搜集史料洋洋大观。在写法上，作者“力摹班史”，文笔生动传神，一洗志书沿袭之陋。“其每叙次提顿转摺，与山势为起伏，读之如蹶屣登临，心目俱迥”。时人有“真形蓬蓬若峙于方寸，群岫落落多得于一览”的赞语。其书在当时史林享有盛誉。

《岱览》在学术上具有多方面的成就，而其中于泰山石刻研究贡献尤大。泰山石刻由于其历史久远、内容丰富及价值巨大，自其产生伊始，便被众多的文人学士著录、引用和研究，或训诂文字，或诠释史

实，或品评书法，前后出现数以千计的研论之作。而《岱览》对历代石刻的搜寻、著录、校勘与考释，时有创获，多具新意，较之昔贤，更可称为青胜于蓝。

其书成就之一在于著录细致、周详、完备，体例上录文、说明、考释合一，完善了泰山石刻的著录体例。

先说著录之广。唐氏于卷首《金石录要》中称：“岱之金石刻甚富，搜录各览，颇为详密，兹摘其尤雅者著之。金元以后，裁择维严，为其近也。佚者载于览而不列于目。唯自唐以上，名目见于他书，而今不知所在者，亦并识焉以备考。”《录要》所收石刻共192则，正文著录则数倍于此。唐仲冕对泰山主峰及周边石刻作了系统普查，凡其认为具有一定价值者皆逐一登录，同时又检索历代金石文献，查找出业已佚失的石刻名目，开列卷中。可以说从田野到文献双管齐下，几做到了巨细无遗。其著录之广之多，已超过了前此诸家。

再说著录之细。此前之岱刻研究，尤以聂剑光著录广博、钱大昕考识精密。但聂氏仅录碑名、位置而无原文，大昕亦只书题跋而不存石文，《泰山图志》、《泰山述记》中虽均列《金石》一篇，但除题记短制外，长文著录甚少。《岱览》中每著一碑，于明以前者大多移录碑文，纳入书中。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碑石，遂因其录存而传世。如双束一碑，此前各书均未收原文，而《岱览》卷十二论云：“（此碑）今已千二百年矣，官名、事迹多可采，不及此时录之，恐日益剥蚀，非徒贵远贱近耳。”遂逐条录存，以贻观者。此类首次著录名碑全文，在《岱览》中尚有多例。

其次是详著碑制、字体、行款、年代、尺寸及碑阴、碑侧等，为后世留下一批珍贵记录。此前诸书大多于此略而不书，唐仲冕则纤细不遗。今举三例：宋《朝覲坛颂》碑，他书只记碑阳而均未及碑阴，而唐氏于卷十三云：“碑断踏已久，乾隆癸酉（1753）邑令冯光宿复植之，孝廉李成鹏跋其碑阴。”又如金《谷山记碑》与元《七佛阁记》碑，金《泰山志》但著碑阳，而《岱览》卷十八则并详两碑碑阴：“《谷山寺记》碑阴文曰：玉泉禅寺勤绩檀那记。都功德主（銜同碑阳）竹溪老人党篆额。……泰和七年十一月初五日立石。泰安东海郡蒋经书丹。历山贾龄刻。”“（《七佛阁记》）碑阴有杜仁杰《佛峪

寺疏文》二、阎复《七佛阁疏文》一，并时震真书。”依《岱览》全书的统一体例，是将金石系于山水，分区域记述，这种体例，便于读者按图索骥，循地搜访。不足处是难以以时代为序来观察泰山石刻的源起流衍。《岱览》为了使读者有史的观念，又于卷首列《金石录要》，将全书中著录的石刻以时序排列一处，这样便有纵有横，纵横结合，不仅展示了泰山石刻的地域分布，而且揭晰了其历史发展、源流变迁。编排之间，确乎是大具匠心。唐仲冕还在卷一《原岱》中对泰山石刻作了全面论述，洋洋洒洒，不啻一篇泰山石刻小史：“於乎！名山之藏，犹存什一，亦惟赖树石镂金于千载之上，为治古文者广搜而切证焉。……自宋以来，独称秦篆，今又亡于郁攸。……今为嗜古家所球图者，《开元铭》耳。《祥符纪》勒，则赵岵已讥之矣。然有唐前后，碑版题名，时复获之。缒险穷幽，悬崖断壁间亦多可珍者，何必邃古。虽欧阳永叔、赵德甫、郑渔仲所录，半就销蚀。而若北齐石刻之《金刚般若经》，分书径尺，师宜之遗，不可拓而可玩也。唐自《磨崖》外，有《老君堂》、《神宝寺》等碑。后梁《小蓬莱题名》。宋《天贶》、《封祀》、《朝覲》诸碑，《种明逸诗跋》、《蔡卞圆通经》，以及金元党、赵遗迹，往往为亭林、竹垞诸老先生鉴赏。书虽小道，抑亦兹山之宝藏也。”

其书成就之二是充分注重田野考察，新发现了一批前人未曾著录的宝刻；同时扩大了原有的著录地域范围，进一步展示出泰山石刻的全貌。

先说石刻的新获。聂剑光的《泰山道里记》已对泰山主峰及徂徕、灵岩、琨瑞等支脉的石刻作了几乎竭泽而渔的调查，而唐仲冕在此基础上，又作进一步搜索，不乏新的发现。如青帝观石刻唐《造太一真武二像碑》，《岱览》于卷十二记称：“右真书，勒碑下方。上方巉石为二，龕内像隆起，与碑面平，太一天尊居左，立莲花上；真武居右，坐重台，足屈右垂左，皆有圆光，其上皆有宝盖。碑两侧，各上下二像，左侧上像，合掌垂足坐下，持莲花拱立，上题夫人供养，下题莊人赵进超一心供养；右侧上像，笼手垂足坐下，亦拱立，上题父供养，下题莊人刘令仙一心供养。有宋政和题名镌盖其上。……像刻工致，书亦方整，堪与鸳鸯碑并存。”此碑虽由聂剑光首发土出之，但《泰山道里记》未能补入，而由《岱览》首次录存。又《岱览》卷二十二著录徂徕山有金石震题名、孔瑞肃题名、安升卿题名、元王天定题识、时震题名、

王野人诗刻、明聂贞题名，卷二十著录云云山有元朱珪题名及朱珪《先莹记碑》等，均不见《泰阴道里记》登录。可见在石刻著录之全备上，唐仲冕确乎是后出转精。

再说地域范围的扩大。《泰阴道里记》于泰山支脉已用较多笔墨，但仍有部分支山付之阙如。《岱览》在聂《记》基础上踵事增华，增补了关于新甫、布山、陶山等支山的内容。石刻的著录范围也随之而扩大。如卷二十三于新甫山著录了“师旷墓画像石刻”、宋《修汉武帝庙碑》等，卷二十于布山著录了元《重修三皇庙碑》，卷十六于羽父山著录了元《云溪观碑》，即不见于以往岱志录存。卷三十二于陶山石刻的著录尤为详尽，所录如唐《佛像记碑》、《陀罗尼经幢》、宋《宣和竹林寺磨崖碑》、金《张汝为题名》、《石柱题名》、《重修幽栖寺大殿碑》、元《重修天王寺碑》、《天和观碑》等，更是唐仲冕陶山深隐探幽的独特之秘，尤为珍异。这些新见石刻的录存，尤为唐仲冕对泰山石刻学的一大贡献。

其书成就之三是其对诸多名碑作了精审校勘，一些碑刻的考释颇具精义。

先说石刻之校勘，泰山大量碑刻因年岁久远，石面崩剥，文字漫漶，难以辨识，后人摹写多有讹訛。唐仲冕多方觅求善拓，精作校核，录入《览》中。如唐《神宝寺碑》，《岱览》卷二十六著录云：“（是碑）班驳断裂，辨识维艰，初稿亦仅存其目，岁乙巳，侨岱庙，竟日兀兀。聂剑光作《泰山金石考》以副本见示，阅之，疑其舛讹。乃取墨拓详校，稍为厘正。如篆额‘碣’字，人多作‘碑’字读之类。然撰书人姓名尚难辨，子寰，‘寰’字颇似‘寰’字，寰即怀，未知孰是。又‘群生’群有作‘郡’字，‘涌’作‘立勇’，‘将将’作‘锵锵’，‘八紘’作‘八宏’，‘提封’作‘隄封’，皆可疑。‘花盆’二字，亦未审。若‘黎’作‘禾勿’，‘乎’作‘虐’，‘寂’作‘宀未’，‘瑚’作‘胡’，‘譬’作‘辟’，‘饮’作‘禽欠’，‘慧’作‘惠’，‘法’作‘灋’，‘倒’作‘到’，则犹存汉法也。”即是一例。

石刻之考释，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：其一是记录了石刻的变迁情况。最重要的一例，即关于泰山秦篆刻石下落的记载，各种志乘众口一辞，都称秦篆刻石毁于清乾隆五年（1740）的碧霞祠火灾。而唐仲冕则据聂剑光的“三亲”闻见，记称秦篆未损于祝融，而是被督工砌于墙内，犹存人世，其云：“聂剑光为余言：泰山古碑毁于修工者，不知凡几，……而秦篆亦以石坚致琢，为令辟以垒垣。……原石剝断，如果尚

在垣间，安知不如《石鼓》重出乎？”为秦篆迷踪留记了一条重要线索。后来果如唐仲冕所预言，在石刻迷失七十五年后，秦篆十字残刻为蒋因培、柴兰皋等人于碧霞祠旁古井中搜得。这一珍石重获，未尝不是因《岱览》一语以导之。

其二对一些石刻的真伪、异说认真考辨，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如此前泰山各书，均称明人林焯以大字铲毁唐玄宗朝尚书苏頌之《东封颂》摩崖，但唐仲冕经过认真辨识大观峰摩崖残文，断定林氏所铲并非《东封颂》，而是唐高宗时李安期之《登封降禅朝觐碑铭》。《岱览》卷九考云：“唐《登封降禅朝觐碑》：右碑，乾封元年，李安期撰，行书，在今云峰上，明州牧林焯以‘忠孝廉节’四大字铲毁，犹存‘波扰五岳……’百字，旁有‘嘉靖元年三月七日衢’九字，盖明方豪题名也，今并此亦佚矣。诸志称林焯毁苏頌《东封颂》，然此百字皆非頌语。拓本存聂叙。则又未知頌谁毁也。”这就澄清了又一桩泰山石刻公案。

其三是对碑刻涉及的一些人物、职官、年代、地名、风俗作了细致考索。如卷十二录《宋禧诗刻》后记：“右额云诗石，并真书，勒唐太一真武二像碑阴。考《宋史》，禧以庆历八年二月同知谏院，五月出为转运使，盖由荆湖北路转京东路。皇祐四年，距庆历八年，五年也。禧有宋罗江之目，其人不足称矣。”又卷十录《上官均题名》后云：“右真书，勒斗仙岩，凡五行，字径寸五分。《宋史》：上官均，邵武人，绍圣初，拜右正言，以章惇怒，迁工部员外，寻提点京东淮东刑狱。此云使事，当是提点刑狱，唯云京兆与史不合。”这些人物行迹考证，有裨于知人论世。而一些关于社会风俗的解读，读来更具兴味。如于卷十八《谷山寺碑阴》后考云：“右碑阴，额文同题，字径寸半，篆书。题名正书，四十四行，行九十字。姓名千余人，中称某翁、某婆、某公、某母、某姥、某伯、某叔、某伯母、某老耶、某老娘、某姑、某姨、某姐夫、某姨夫、某舅、某兄、某哥、某嫂、某郎、某姐、某先生、某官人、某善友、某解元、某孔目、某都料、某评事、某内奉，又有都监郎君、校尉郎君、军人船户、某居士、某道人、某和尚家，各色俱备。其以亲属相呼，盖各劝缘者所书，沙门即连属勒石也。”这一题名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称谓情况，是了解金代社会的绝好材料。唐氏能特予注意，目光如炬，胜于他家（他书均不记此题名）。

唐仲冕《岱览》在取得以上成就的同时，其研究也存在如下不足：

首先是其著录石刻地点、年款、存佚等错讹较多。

《岱览》著录地域既广，自不免百密一疏。我曾以《岱览》所记岱顶、岱阴石刻与原石对勘，发现著录存有失误者便有多处。地点错误如卷九记宋张洙题名、金徐铎题名、濮国长公主题名，唐仲冕均记在德星岩宋摩崖西侧，实际以上石刻均在唐摩崖东之石缝内。年款错误如卷十七所载龙拂父题名，唐氏云：“古淄龙拂父题，天启丁巳夏。”今原刻尚存，题年分明是“万历丁巳”。而且原刻前文一大段，《岱览》全脱去未录。存佚错误如卷九记宋张洙题名：“右真书，……今漫灭。”其实此题名犹存石壁，一字未损。凡此失误的存在，都降低了《岱览》著录的准确性。

其次是一些碑文校录不精，一些名碑失于载录。

《岱览》在校录碑文上，既有精审之篇，也多草率之处。以卷六所录《天贶殿碑》碑文，其中脱漏、讹字，便达三十七处之多（据严承飞《岱览点校》校记）。未免失之太疏。又如卷三十二所录唐《佛像碑记》，标注“缺”文之处多达二十余处，我用原石对勘，发现这些缺文大多可以辨识，经我重录后的此造像记缺字甚少。可见唐录亦非件件精审不移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，即一些名刻在唐仲冕时仍然存世，但或因难于辨识而摒而不存，或因误判价值而弃置不录，成为《岱览》石刻著录的又一遗憾。这方面可以举三个例子。一、岱顶振衣冈《严公礼岳祠记》，《岱览》卷十著录云：“右刻，己酉七月杜仁杰撰文，商挺真书，在斗仙岩，为‘振衣岗’三字所掩。”现经实地察看，《礼岳祠记》虽确为“振衣岗”三字所掩，但掩而未尽，原刻三百字中，所损不足六分之一。此刻为杜仁杰重要佚文，唐氏不加细录，未免太疏。二、《岱览》卷九在著录大观峰“从封诸王从臣题名”中提及上覆有“蒙古字”。泰山之巅有少数民族文字刻石，此点各金石书绝无道及，实为探究泰山与民族文化交流之重要关目。唐仲冕纵不能识读其文，也应大书特书，予以专条著录，但其书除于论唐人题名时偶尔提及外，再无只字叙述，使人颇疑其识力不够。三、陶山石刻为唐仲冕著录重点，却也时有遗

珠之憾。唐开元间所刻《优婆夷阿刘造浮图铭》，立于幽栖寺，是今知最早一方记述“杞梁妻哭齐长城”的碑石，而唐仲冕亦弃之《览》外，未免有求诸千里而失诸眉睫之叹！

最重要一点则是考论缺少通识眼光，史观颇多陈腐之处。

如《岱览》卷三十二著录有《唐·贞观佛像记碑》，唐仲冕考论云：“右碑，在韦驮殿南墙下，高二尺五寸，阔三尺二寸，上半刻三佛像，残缺不完。案碑文义，似叙其祖父官勋。立碑年月无考，土人以有‘贞观’字，呼为‘贞观碑’，今仍之。”语多泛泛，鲜所发明。今按此碑记中有“横行静海水之戈，直踢扫辽城之障”语，为唐初征高句丽战事之反映，此碑为存世不多的反映唐初征辽的题记，于探究七世纪中韩交往大具关系。唐仲冕作为唐文专家，而不能揭出此点，其史学眼光远逊于同代钱大昕等人。二、同卷所录唐《陀罗尼经幢》，前称“经文未录”，后考称：“右幢八棱，立于殿前阶台之东，高五尺二寸，有盖有座，俱镂花纹。”仅及形制而未及内容。按此幢今移存岱庙，其前“赞语”中涉及黄巢起义军转战陶山的情况，是极为罕见的记载黄巢事迹的刻石。唐仲冕于此文即一字不录，考识也绝不言及，不能不视为其考史证石之大失！

而唐仲冕在石刻研究中显示的历史观，较其时人也多陈腐落后之处。今举示一例：卷九著录金濮国长公主登岱题名云：“皇姑濮国大长公主□□□□，同驸马浚州防御蒲察，敬诣岱岳，焚香致礼毕，明日遂登绝顶，拜于玉仙祠下，时明昌元年三月十二日。”唐仲冕于石刻后发论称：“案妇人出门祷祀，非礼也，况王姬乎！题名岩石，亦可耻矣。《金石文字记》录灵岩诗，有元至治年忽都虎郡王太夫人八达氏诗二句云：‘岩前松桧时时绿，殿上君王岁岁春。’大字刻之，尤堪一噱。”唐仲冕所处的乾嘉时代中，早已有众多思想家开始推崇女性的才能与作用，甚至发出女子“行止见识，皆出于我之上”（《红楼梦》第一回）的赞叹，而唐仲冕则仍对金元女性登岱题诗耿耿于怀，斥之为“可耻”，其妇女观已远远落后于时代。更为可惜的是，唐仲冕只顾对女性石刻作肆意谩骂，却大大忽略了此类石刻所蕴之历史价值，——在泰山石刻中频频出现了金元贵族妇女登岱题名题记（除唐仲冕所举金濮国公主、元八达氏夫人，类似石刻还有灵岩寺大定十五年唐国公主谒寺题名），实缘于当时塞北民族风习。据元人孔齐《至正直记》卷一“妇女出

游”节云：“人人往往习染不美，皆由出游于外，与妇客燕集，习以成风。始则见不美者诮之，终则效之。”可窥一时女性风尚。濮国公主之登岱游观，本是出于其族旧俗，而其题称“拜于玉仙祠下”，则显示了此际女真民族业已接受了泰山玉女信仰，是探讨泰山崇拜影响到少数民族的绝好史料。唐仲冕对此紧要消息茫然不察，徒发毫无价值的道德评判。使人感到此时的史学家唐仲冕，已为道学家的唐仲冕所蔽！

唐仲冕《岱览》于泰山石刻研究虽存有以上不足，但就其整体而论，却无愧于乾隆朝岱刻研究的集大成之书，许桂林在《岱览跋》中称此书：“凡诸碑碣，亦有等差，或已佚仍题，或见存弗载。尽斟酌之善，比郦（道元）魏（收）而更审；寓品别之权，视欧（阳修）赵（明诚）而尤核。”后二十二字，若用以概括唐氏《岱览》的泰山石刻学成就，仍是十分恰当的。

注释：

①唐仲冕，字六积，清湖南善化（今长沙）人。幼从父唐焕宦游山东，其母卒葬肥城陶山，仲冕遂结庐母墓之侧。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主讲泰山书院。其间“历扞葛攀萝之险，亲历岱峽”，以十馀年之功，编就《岱览》。后中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进士，历任陕西布政使，权巡抚。所著除《岱览》外，尚有《陶山文录》、《陶山诗录》等。详拙作《东岱寰中秀，图经手自编——清代泰山学者唐仲冕》（《肥城春秋》第六辑，1988）及李少静《〈岱览〉及其撰者唐仲冕》（《山东图书馆季刊》1995年第3期）

②《岱览》石刻著录及所作考释，有半数以上与金荣《泰山志》文字相同或相近，这便存在一个孰创孰袭的问题。以成书时间而论，是唐《览》在先（乾隆五十八年）而金《志》在后（嘉庆三年）；但若以刊刻时间而论，收入金《志》这些考释文字的《山左金石志》在先（嘉庆二年）而唐《览》在后（嘉庆十二年）。金《志》中明确提到唐《览》（见卷二十《叙录》），而唐《览》中则未提及金《志》或阮《志》。从这种状况看，似是金《志》因袭唐《览》。但经细加对勘，却也自唐《览》中发现不少因袭金《志》的内容。如西晋《孙夫人碑》为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金荣幕客江凤彝所发现，此为金《志》石刻著录的一个新收获，而唐《览》也将此碑列入其书卷二十三。其他如唐《览》卷二十五《建辟支塔题名》引朱文藻

考，卷二十四《唐灵岩寺碑》引黄易藏拓，也应采自金《志》（朱文藻为金《志》参修者；黄易为金荣友人，其访碑泰山在嘉庆二年）。总之，唐、金两书存在相互借鉴、袭取之处，多条归属，破难明晰区分。因此本文在论列唐仲冕泰山石刻研究得失时，尽量不以两书雷同部分为例。

（原文刊于《山东图书馆季刊》2007年第4期）